

主題 | 「回溯713—外省爸爸沒說的白色恐怖」

時間 | 2019年12月14日（週六）14：00~16:00

地點 | 成大奇美咖啡館（自強校區）

主持人 | 林寶安（澎湖科技大學教授）

與談人 | 莊效文（真理大學助理教授）、張文竹（山東流亡學生當事人第二代）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國家人權博物館、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合辦單位 | 富邦文教基金會、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高教深耕計畫、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辦單位：大家午安，非常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奇美咖啡館。今天的主題是跟外省的白色恐怖，以及山東流亡學生還有713有關的主題。我們這次特別邀請的主持人是林寶安教授，他是專門研究山東流亡學生跟713有關的議題；另外兩位莊效文教授以及張文竹老師，他們是山東流亡學生的第二代。那我們現在就歡迎他們。

林寶安：各位，我不知道在座大家的背景，今天很開心，因為我們三位都跟台南有關係，也都跟山東流亡學生有關係。謝仕淵老師因為這次展出的策劃，我想在座可能大家清楚這樣一個背景。我會來擔任這個主持事實上是，臨時被找來墊檔的。大家如果有關心這件事應該清楚：今年是713事件的70週年。

我目前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任教，過去幾年剛好有機會從文化部的人權館這邊有一些計畫，委託我這個團隊來做有關於山東流亡學生的一些當事人，還有後來我們也做了第二代像文竹老師的一些口述歷史整理。緊接著就在去年我們開始籌備今年的特展，後來就是由謝老師，因為謝仕淵老師他是博物館展覽的專業，他之前在台史博擔任副館長，也有很長的一個經歷。後來就由他主導，然後我協助擔任策展，把我們過去搜集的一些，整理的口述歷史和一些文物，在澎湖的開拓館展覽。後來也在人權館的景美園區這個地方展出。展完之後，因為謝老師後來又另外去爭取，舉辦了一個活動，就是「第一次策展就上手」這樣的活動。

後來在人權館展出的70週年的一些展品，就把它移動到我們成大博物館。然後這中間「第一次策展就上手」的時候，他們又增加了很多東西，他們招募了一些高中職老師，還有一些學生、關心的人士，共同去整理了一些資料、文物。其實我最近因為非常忙碌，一直還沒有時間去看整個展出的一个概況，除了我們原先知道的之外。

所以先講這個背景，其實是因為後來我來這邊也跟這個展有關聯，但是比較重要的是，除了邀請文竹老師外，也邀請了莊老師。我先介紹一下文竹老師：文竹老師是第二代，她目前是在台北的漳和國中擔任國中老師。我們待會就會提到一些她的背景，我想就先不講一些細節。另外莊效文老師他是學音樂，音樂史方面的博士，我剛剛才知道說原來他在台南藝術大學任教，後來又到中山，現在因為可能要回去照顧爸爸媽媽，所以特別回到北部的真理大學，其實昨天晚上我們才真正第一次通話，因為謝老師交付我這個任務的時候，我都還不知道莊老師的背景，他只告訴我

說，莊老師也是第二代，大概是這樣，後來我大概也有一些了解。

所以待會可能會分上、下半場，我們中間可能沒有辦法休息，因為我覺得兩位的故事都很精彩，所以如果中間各位有需要做任何事情，隨意，不要干擾到其他人就可以了。

文竹老師會是上半場；然後這邊結束大概就會緊接著請莊老師這邊來進行。所以先歡迎兩位，先掌聲謝謝他們來到這樣的一個座談，謝謝，那我們現在就請坐。

我想請文竹先談。我剛剛講說我們三個人都跟台南有關係，我本身是台南人，庄跂佇歸仁，歸仁這邊而已。文竹本身是台南的媳婦，永康這邊，但是文竹的生命歷程是很特殊的。我這麼說好了：對我們來說我們從小，我在歸仁長大，我從小在閩南的一個環境長大，對我來講的話，唯一就是，我唸到國中的時候，因為我們鄉下要到國中去唸書，就開始被人家笑，因為我們家的口音比較接近茄苳那邊，口音非常的土，常會被人家笑，講話都有一個尾音：你欲去佢「噠」，怎麼樣，這樣一個尾音。生活裡面的這些接觸才會讓你 know 自己是誰，往往是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文竹，我覺得這個地方，我想先從一個地方先請文竹來跟大家分享。因為文竹的父親的經歷，她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說，自己本身是一個山東流亡學生的第二代，我想這個部分先請文竹從這邊開始講，妳發現自我的這一個過程。

張文竹：大家好，我是張文竹。要從哪邊開始說呢？我覺得事情可能要從我年過30歲開始說。我覺得我是從我30歲之後，一路一路推到我的出生之前。我的人生旅程是這樣的：我爸爸走得很早，我爸爸在我8歲就過世了。剛好我現在懷著身孕，其實我不是老蚌生珠啦，因為我跟我爸爸年紀相差很多，我爸爸50歲才結婚，53歲生下我。所以，說真的我還沒有看到一個後人，像我的這個年紀的。因為跟我爸爸，我們中間等於隔了一個世代，尤其是在我結婚之後，我老公的爺爺奶奶才跟我爸一樣大。所以我們中間是有一個世代的空白。我媽媽也是外省人，說真的我還沒有遇過兩個外省人結合的家庭，我父母、爺爺奶奶都是山東人，我外公外婆都是上海人，他們是1949，我爺爺奶奶，沒有，他們在山東，我爸爸1949過來；然後我的外公外婆是1949過來，我媽媽是他們在台灣生下的第一個孩子。我覺得這些後來造成我生命與婚後一些很大的撞擊因素。

我要講就是我30歲之後，因為我爸走得很早，所以我就這樣子很懵懂地長大了。我8歲的時候我爸就過世了，我媽媽一個人扶養我長大。因為我媽媽那邊也是外省背景，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外省背景的話，不太會有家族的支撐。我媽媽其實也是算她那一代，就是比較小的。因為我的外公外婆，我的外婆民國前1年的，我的外公民國2年的，又是一個世代的隔閡。所以我小時候我外公根本不可能照顧我，或是，我外婆早就不在了。所以我們是沒有一個家族的體系在支撐的。那我也覺得這是很自然，而且也是很正常的。我就這樣子，開始慢慢地長大。我記得我們在我小時候，我們小學的時候填那個AB表，都還有一個籍貫，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我那時候都是寫「山東煙台」。因為山東煙台是他們從小就給我的認知。所以

我對於台灣這個地方從來都沒有人教我要寫台灣人，即使我生在台灣這個地方。他們都說，妳是山東煙台人。我小時候，有看過我爸回去一、兩次山東。但因為我實在太小了，不懂什麼戒嚴，解嚴，我只是想說，為什麼我的家在那麼遙遠的一邊。然後我爸爸山東口音很重，我媽媽跟她姐妹講話都是用上海話，要不然就是四川話，所以我就跟老師說，我其實在一個虛擬的中國裡面長大的。我雖然長在台灣，可是他們給我構築的環境，都是虛擬的中國，也不是真實的中國。

到了年過20吧，我媽才在整理我爸的遺物，整理一些有關山東流亡學生的報導。然後就跟我說，你爸爸是山東流亡學生，他是怎麼來的，他怎麼來到台灣的。可是我必須要說，20歲的我對這些事情其實是沒有感覺的。就是，我覺得，哦，又怎樣？不關我的事呀，我生在這邊，我活得很好。然後，一直到出社會、工作、結婚。結婚之後，我很快有了第一個小孩，就是我女兒。這是在那顆種子，在我體內發芽的時候，我突然間，也想起了我是種子的那個時候。等我想要跟她講說妳爸爸媽媽的事情，我發現，我並不知道我以前的事情。我那個時候覺得好害怕，我發現我是一個一片空白的人。我發現在那後面是一片白光，尤其是在我進入台南，就是我跟我先先生結合之後，那個家族的支撐，讓我覺得，天啊，原來我後面什麼都沒有。就是這個東西讓我起心動念，後來我就去唸了在職專班，在職專班的時候我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他就是鼓勵我，然後藉由寫論文，或許可以找到我自己想要找到的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寫論文，我論文做的是張放，張放也是山東流亡學生，是那時候的文學家。我覺得我是通過寫論文的過程，然後找到自己。然後我才開始直接地去找我爸的東西，包含我爸的訃文，他的生平、簡歷、家書，我才會去翻。

所以我才說我的生命從30歲之後立刻回來的過程，因為我在30歲之前，我其實不認識我自己是誰。我覺得我寫籍貫山東煙台，只是一個制式化的。那個地方跟我並沒有聯繫，跟我沒有感情。可是我覺得婚後，進入一個家族，甚至我有了自己的小孩，我才發現空白這件事對我來說有多麼害怕。所以我才會開始搜集相關的史料，然後進行一些整理。因我爸爸那邊會有一些好朋友，我積極地請他們去幫我找在山東煙台的親戚。大概去年還是前年吧，我就完成了這個旅程，從澎湖然後再回去山東，再從煙台再回到台灣。大家都以為我去尋根，殊不知我是去告別。去到那邊我深深地了解到，這70年的差距，跟這70年的差異。

然後，我覺得回不去，回不去的不只是我，不只是我的初心，我覺得這個隔閡已經不是時間跟空間可以彌補。雖然說那天很禮貌地跟堂哥說了再見，可是我心裡其實也默默地明白，此生可能不會再見。因為那個土地跟我的聯繫實在是太過遙遠。然後跟我的情感，情感的羈絆，也太過疏鬆疏散。我找不到回去的理由。可是我知道我必須要走這一趟。走這一趟我才能徹底地明白，原來我來自那裡，然後，不好意思，再見了。我這顆種子已經在台灣重新紮底、紮根了，要在這邊茁壯，並且在這邊生，撫育我的下一代。

我沒有特別跟我女兒說我是山東人了，我會跟她說我們是台北人，因為我在台北長

大。就我們台北人，對，要不然，我不知道台南這地方，我覺得她非常地，我是臺南人我有種驕傲，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這樣覺得。我老公很堅持，妳是台南的女兒。我女兒在我肚子裡五個月，我老公說彌月、滿月蛋糕一定要台南的，台北、台中都不行，就是送出去的蛋糕，要讓大家知道有個台南的女兒生了。所以他就是很堅持，台南就是她的根，就是她的家，然後我女兒在這個地方重新的孕育出來。

林寶安：文竹剛剛提到說，後來有回去尋根。這中間當然有一個部分是因為我在前年訪了幾位第二代，文竹老師是其中一位，另外還有陳芸娟老師，還有一位是旅法，目前在法國的蔡小姐。其實文竹老師的父親一直到50歲才結婚。我想，現在這個時代，有些人可能不結婚，但是，流亡學生，或者是那時候從1949來到台灣的外省的，特別是單身過來的，後來他們有些人的婚姻都比較晚。可是，老實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晚，50歲才結婚。然後，文竹在她8歲的時候，她父親就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談一下，當初爸爸為什麼一直到這麼晚才跟媽媽結婚？以及，剛剛文竹也提到，山東流亡學生沒有親人，所有親人都是在遙遠的天邊，在山東，幾千里外，那社會的支持網絡事實上是很小，非常小。最重要的人就是當初一起過來的，而且這一批因為今年特展的這個過程，也因為文竹的關係，就跟那個時候她父親的一些同袍、同學...目前主要大概都是遺孀，或是第二代，當事人的話大概都不在了。這個過程我想是我們比較希望了解。因為這一些流亡學生其實當初來了，據我們所了解，應該有五千多人。那當然她父親，或像待會我們莊老師的父親，這些都是其中一位、兩位，可是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來到台灣之後，怎麼樣的經歷，我想都是我們所關心的。因為他們來到這邊，其實很多，包括她父親也就留在這邊，也沒有再回去了，都是屬於台灣的一份子，我覺得從這個角度我們應該更關心他們，尤其是關心到他們第二代已經在這個地方，第三代已經出生了，在這個地方和台灣社會一起連結起來，我覺得這是我們所需要了解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談一下當初妳父親為什麼會那麼晚結婚的這個過程。

張文竹：我媽媽還在，據我媽媽的說法，我爸爸根本沒打算結婚。因為他覺得他是要回家的，他覺得我們遲早都是要回山東去的。我爸沒有想過要透過通婚，甚至置產，都沒有，就是融入這片土地，他完全沒有。50歲之前的他，孑然一身。我爸是小學老師，員林實中分發之後，他就住在以前小學最下面一樓樓梯的儲藏室，然後都會住一些工友，我爸就選擇住在那裡。因為他住在那裡面不用花錢，也不用買房子。他穿得好、吃得好，他就是住得很差。他每天都從樓梯口那邊出來上班。他沒有想過要結婚，也沒有想過要置產。我覺得他心裡應該是充滿著要回去的嚮往。後來遇到我媽，其實我覺得我媽也是蠻命苦的，因為我媽跟我爸差18歲。那時候我外公其實很反對我爸跟我媽結婚，因為，我只能說我外公的預言跟靈感直覺真的太準，他說，妳這樣嫁給他注定是要當寡婦的。但有時候就是愛沖昏了眼，盲目沒有理智，我媽32歲，我爸50歲，就結婚了。

那時候我爸是小學老師，講一下他們的愛情故事，我媽是代課老師而已，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學校老師就幫他們搓合，連三個老師做媒都做同一對，就是我爸跟我媽。然後他們就談戀愛，那我爸說真的山東嘛，山東漢子，長得又高又帥的，50歲，身材也沒什麼變，然後我媽可能一時讓愛情沖昏了頭，兩個人就很快地就結婚了。結

婚之後我爸才想說要買房子。然後，他就跟他的一群山東流亡學生的朋友，開始在那邊看房子，後來我們家買了一間4樓的公寓。

雖然買了房子，我覺得我爸內心還是充滿著，第一個就是戰爭，第二個就是苦難，第三個就是要回家，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解嚴。所以他就把他剩下的薪水...我家真的藏了很多小金塊，因為我爸都把他的薪水都變成黃金。我爸爸喜歡把它打成小元寶，然後放在家裡面，方便我們，我們如果要逃了，拿了一袋元寶就可以走了。那時候新台幣是沒有用的。小時候我都知道我爸爸把那個小元寶放在一個紅色的錦囊裡面，然後就藏在櫃子的抽屜裡，裡面有很多的小元寶。家裡沒有現金、沒有錢，就是小元寶。他可能準備要帶我們一起逃吧，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家說真的沒有什麼現金，但是金子倒是有一些。我爸跟我媽結婚之後，才買一個公寓的4樓這樣，

然後，這點我也要誇獎一下我爸，我爸真的蠻厲害的，50歲之後還可以生3個，這個我真的要誇獎他一下，50歲之後還可以生3個真的不容易，我是老二，我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

林寶安：我後來開始做這個計畫以後，才比較懂這個「不結婚」這件事情。因為我以前在讀書，成長的歷程裡，對於外省，我老師是外省，我有些同學也是外省，可是，我不太能夠理解那種心情就是說，為什麼婚姻這件事情在他們的生命裡面，是這樣地跟我們台灣人不太一樣。因為我在做713之前，先做了另外一個澎湖的，那是龍應台擔任文化部長的時候，她有一個台灣故事島，做國民記憶庫的部分。那個時候也是有訪問到一位軍醫，他也是山東，不過不是流亡學生，他是山東的老軍醫。他是另外一批過來，可是他後來結婚的時候已經45歲了。45歲才結婚，這個也是一樣，長得也是很帥，目前還住在澎湖。他後來的對象是誰呢？是澎湖西嶼鄉竹篙灣那邊的一位女子。這也是人家介紹，因為他有段時間剛好派駐在澎湖這個地方，擔任軍醫的主任。我是透過訪談的時候，才了解說，整個1949來的這一批外省人裡面，其實有一批人他們心目中的生命終究是想要回去的，他們沒有想過說要留下來。其實後來，我在整理713的一些訪談，不管是當事人或是整理一些文獻的時候，這樣一個感受是越來越清楚。

對很多人來講，他從來沒有想過說台灣會是他的一個落腳的地方，他必須要在這個地方成為新移民，他必須要把這個地方當作新故鄉，對他來講這只不過是中間的一個暫時停歇的地方而已。等到戰爭結束了，就要回去了，所以，婚姻大事，結婚的事情也好，任何事情也好，是從來沒想過的。也就是說，這終究是要有父母來做主的事情，不會是個人。所以文竹老師在講這件事情，我第一次聽到說，她父親竟然沒有置產，然後所有收入都是拿去買黃金，我真的可以深深感受到當初流亡逃難那種的心情，這心情怎樣在他後來的生命裡面轉變成生活的一種，怎樣安排他生活裡面很重要的種方式。我覺得這一點是這幾年之後慢慢懂。我一直覺得說，在台灣這個社會來講，我開很多課程，我在課程裡面我都會跟學生說，我們其實要感到很驕傲，因為台灣是一個在不同階段都接受不同移民進來的一塊土地，如果沒有這麼多不同的移民，台灣社會文化的豐富性不會那麼強，不會那麼大。當然這過程裡面也

會有一些衝突，這個不可避免。省籍、二二八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例子，清朝時候比如說械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我想這些都是告訴我們說，族群間的接觸不必然和平的，不必然是一開始就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中間一定會發生一些衝突。就像現在我們看東南亞新移民其實也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回到剛剛講的，當初爸爸50歲才結婚，他大概是17、18歲就來到台灣。所以中間有30幾年時間，除了那個時候因為在澎湖當兵，後來大概10年就去員林實中，後來就分發，這一個過程裡面因為剛也談到說，當初可能很重要的一個社會生活的圈子，就是跟著這些伯伯叔叔們。那我後來跟他們的這些伯伯叔叔的後人、另外一半，有機會今年在713之後有機會和他們相處，我覺得這是不同的一個經歷。

我剛也跟莊老師提到，我們明年1月，因為人權館覺得我們今年算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戾點，待會就會談到。今年因為特展的關係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第二代，或是當事人，因為這一個展，而開始有些連結，我們怎樣進一步整理，是很棒的，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可以再談一下，在生活裡面，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比如說我們是在地，對我來講的話在鄉下，所以我們家、我爸、我媽，那邊會有那個很龐大這一個...尤其阮這台南的，那一種社會網絡其實是很綿密的。我媽媽是老大，她底下11個弟弟妹妹，你就知道我外婆那邊是多龐大的家族系統。所以我想這一個差異性以及他在後來一些重大事情的時候，文竹可不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張文竹：我覺得我們家非常缺乏親族的支持，尤其我們是以父系統社會為主，我覺得我爸真就是孑然一身，其實我回想起來...不好意思我要岔開話題一下，我爸61歲過世，我覺得我爸這一生都非常坎坷。因為他17歲逃亡來澎湖，其實他一路上都身不由己。然後到713事件，因為我爸爸是煙台聯中的，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張敏之校長的冤案，所涉案的相關人，全部都是煙台聯中的學生。我爸爸好友也其中有一些受過刑。所以我覺得那個白色恐怖對我們家，對我爸爸的身心靈的恐懼是非常深的。我們家是不可以談政治的，因為我們都覺得有人在監控我們，我們都有點疑神疑鬼的，都覺得有人在監控我們。因為我爸過世之前，張敏之校長都還沒有平反，我們家對於這件事情，電話中也不談。我爸爸、叔叔、伯伯，他們都買在三重，他們買在一起，要聊天，電話不談，都是來家裡，就是來我家。因為我們家的小孩最小，大概可以全都關到房間裡面去睡覺，有些叔叔伯伯家小孩都已經大了，有時候聽到一些不該聽的，會說出去惹禍上身。所以我覺得我爸這一生蠻坎坷的，17歲，一路上都被命運推著，然後來到這裡。那後來他返鄉的時候，就是開放解嚴，開訪兩岸探親的時候，我爺爺奶奶都已經走了。我真的覺得好替他傷心喔，就是17歲這樣一別，一別之後就是永別。其實我問過我媽媽，我爸知不知道我爺爺奶奶已經走了？我媽說知道，她說其實他們還是會透過香港，輾轉的寄來一些信件。但是我們對於親人的過世，尤其是父母的過世沒有辦法奔喪，其實是相當無能為力的。

然後我不知道是因為信仰的關係，還是對岸的狀況，我爺爺奶奶連衣冠塚都找不

到。全部都沒有，老家都蓋起新大樓，那至少有個墓吧？沒有，什麼都沒有，就是，一片荒蕪。我連想要找到一點點我們老家的足跡...據我媽的說法，我爸他們家在山東，在山東也算是有名望的家族，有一點錢的。充公之後，什麼都沒有。沒有被批鬥就不錯了....沒有，有被批鬥，什麼都沒有，人就這樣死了。所以我自己覺得我爸這一生是蠻坎坷的。他就是，後面已經沒有親人了，往前走也不知道能走到哪裡去，後來遇到我媽，生了3個小孩，可是我爸死的時候很不甘願，因為他覺得，他都沒有看到小孩長大，他就要走了，所以我爸死的時候眼睛沒有閉上。他真的是不甘不願。他覺得老天沒有好好對待他。以我現在成人的角度，我也覺得老天爺沒有好好對待我爸。17歲，到他61歲，他這一生都帶著遺憾，不管是對父母，對妻子，對兒女。對他的一生都沒有看到一個完整的，父母不能送終，妻子沒有照顧，兒女沒有長大。所以我覺得我爸命運算是蠻坎坷的。存了一堆金子，金子之後也不知道怎麼辦。我媽媽後來拿了一些給我當嫁妝，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後來不動產比較值錢，金子這個東西價值真的相當有限。

林寶安：我們待會有一個QA。剛剛文竹談到，後來回去都沒有墓。其實是文革時候的一個問題。那個時候很多廟，或是說墳墓都不見了。當初這些能夠來的山東流亡學生，都是在唸高中。在那個時代可以唸高中，不要說大陸，台灣也是一樣，一定都是家境相當好的。所以，當時候基本上來講，這其實也是後來713事件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為對他們來講，好人家出身的小孩，他從來不會把當兵當作是一個選項。所以，後來是在713的時候被編兵，進入到軍隊，對他們來講是一個無法接受的事情。所以，後來校長、老師想幫他們爭取受教權，導致這個冤獄案，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背景。

那至於說，墳墓都已經不見了，所以我會看到很多當事人回去探親的時候，基本上帶他們到一個當初可能是父母墳墓所在，在那個地方對著一個荒郊野外，或者田園的地方，在那邊祭拜，這是一個景象；另外一個景象是，大部分回去的時候，可以回去探親的時候，大概都會修祖墳。很多人大概都是修祖墳。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背景。我覺得對於台灣來講的話，兩岸之間很多的這種歷史走向，已經是不一樣，我想這個也是必須要去理解。

剛剛本來想要請妳談的是，跟初伯伯他們生活裡面的這樣的一個支持。

張文竹：我們家後來看法就是，我爸那群朋友，我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我們電話中不會聊正事。要講事情要喝酒，就來家裡。不管什麼事就是不在電話裡講，就是來家裡。然後，這些伯伯叔叔們確實是我童年很重要的支持。我以為大家都跟我一樣，都是小家庭，然後沒有爺爺奶奶都是很正常的。然後過年，我跟老師說，小孩最重要的就是紅包，過年，我爸爸那邊的紅包，都是這些叔叔伯伯給我的。然後，我非常習慣生活中有他們存在，因為他們真的常常來我家，不管是聊天、喝酒還是吃飯，都常常來我家。我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因為他們都說大人在講話小孩去睡覺。我也是個很乖的小孩，小學生，幼稚園，就去裡面睡覺。然後，直到我爸爸過世。其實我媽媽那邊還是有一些姐妹，但是我外公也老了，就不

太行。那個時候我爸爸過世，我爸爸過世的那天我真的印象好深刻，因為那天是農曆12月24，他的頭七就是除夕，那個年真的有夠難過的，有夠悲慘的，而且沒有人敢來我們家，都說我們家是喪家。其實我小時候不了解這個道理。我以為大家過年都要到處去串門子，大家都要來我家給我紅包，我一直以為是這樣，結果沒有。那一年什麼都沒有，就只有我爸爸的叔叔伯伯來我家，給了我紅包。那一年應該也沒有吃年夜飯，我什麼都不記得了，只記得他們在討論治喪的事宜，就是我爸爸要過完年才出殯，才告別式，才火化。我爸後事都是這些叔叔伯伯幫忙處理的。因為根本也沒有人會幫我們。即使到後來我都已經長大成人了，我們一家跟他們一家的感情聯絡還是很綿密。就是有什麼需要，或是他們要聚餐什麼的，都是還是可以一起出現。即使我們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

林寶安：張伯伯、文竹的父親，其實他們有幾位，初伯伯，初媽媽，因為這一次在713，在澎湖的時候有見面就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們那幾戶，那幾個同袍，張伯伯、初伯伯，還有另外一位張媽媽，大概有4位，我身為一個外人，我可以感受到他們那種非常緊密的一種關聯。也是因為文竹老師的關係，各位如果這幾天...好像一直到明年3月8號之前，在成大歷史博物館，這一次展出的一些展品、一些物件，事實上都是初媽媽，所以你們去看可能會看到這個初福山先生，或是說，還有一些文物都是文竹老師的父親，跟他們這幾位的同袍，同學的一個很緊密的關聯，然後，他們在那個過程裡面，他們也是很用心，就把這些資料都保存下來。到時候大家去看的時候其實也可以留意，因為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很難得的，像那個畢業證書，那個是宣紙，很薄的宣紙，當我們拿到那個東西的時候，真的是非常感動。因為這樣的一個經歷，70年，在戰亂裡面，到處流亡，竟然可以把它保存良好，這個非常不容易。

所以有些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這樣一個戰亂時候，能夠一起走過來，這些真的也是出生入死，真的是同生共苦，共患難的情感。我覺得對我們這一代來講，不容易去理解體會，但是，卻是很真實的在生活裡面。所以後來我去台北洽公的時候，他們還一直要我說，因為他們去澎湖我當然會請他們吃飯，然後去台北他們說一定要我留時間給他們。所以後來在台北我們也有一次再碰面再聚了一下。我覺得這一個部分其實是身為不同的一個出身背景，我們應該去互相理解的一個部分，因為像文竹老師後來在張伯伯他們這樣的一個小家庭出生，後來，就是當這兩個可愛小女生，還有一個她的爸爸，小叔，她先生因為正偉，她先生也是國中老師，然後剛好今天學校校慶，擔任行政工作組長，所以沒有辦法抽身回來。我跟她先生也都很熟，我覺得在這一個過程裡面像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我後來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我覺得去互相的認識跟了解彼此是一個怎麼樣的，去讓這個社會更和諧的一個開端。

所以，我們後來透過一些我們所能夠爭取得到的當事人或第二代的一些協助，然後把這些展品它呈現出來，我覺得那一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開端。那當然，後來我們從713以後，不管是在澎湖或是台北人權館都有辦幾場相關的座談，我們藉這個機會要感謝人權館，因為沒有人權館的努力，我們大概不太會有這個機會坐在這邊，

也把一些展品展示出來。

我想最後是不是可以請文竹再談一件事情，妳父親當初本來沒有要結婚，但後來跟媽媽結婚了，後來在這個地方算是成立一個新的家庭。可是妳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一個部分是，妳嫁給了正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差，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妳談一下，因為我覺得這對於不同出身的人講，不太能夠去真正了解的面相。

張文竹：大家知道我在虛擬的中國長大的，我真的是，他們打造出來的世界...他們也不是故意的啦，因為我媽媽也是在眷村長大，然後眷村都是講當地的方言，他們那時候都講四川話。我媽非常喜歡上海話、四川話，她姐妹也這樣溝通。我在虛擬的中國長大的，直到我嫁给了我先生。我先生真的蠻恐怖的，他是標準的他台南人。我覺得台南人特別不一樣，台南的傳統的、本土的驕傲，我真的這樣覺得。他們對於他們的土地認同感是非常重的，他們的家族支持網絡也是綿密的。我公婆都是土生土長的台南人，然後祖輩都住在台南。對我來說，嫁給他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大的文化衝擊，因為我在虛擬的中國長大，但他在真實的台灣長大的，我們之間的撞擊其實很多，包含我不知道各位聽不聽得出來，我完全不會講台語，因為我從小就沒有這個環境，可是我公婆他們很習慣，就是用閩南語講話，我都傻笑，假裝聽得懂，甚至是好多的稱謂我都搞不太清楚，什麼阿嬤啊、嬤婆啊，什麼……我想說他們是誰啊？第一個不會講台語，第二個他們是誰啊？就搞不太清楚，想說這是怎麼回事。然後他們都對我這個背景的人充滿了好奇。我老公說我身上有一股驕傲，說我身上有一股外省人的驕傲。所以我們兩個是彼此的驕傲，就互相的碰撞，看誰先磨損掉誰的驕傲，但，感情在一個家族的構築裡面是可以克服這一切。我覺得進入我自己組成的家庭，甚至生下我自己的小孩，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因為他們家就太土了啊，我要花很多時間去適應。然後，我也要跟我的小孩說，妳祖輩的故事啊，妳爸媽的故事啊，妳阿公阿嬤的故事啊。然後我覺得我女兒其實也是懵懵懂懂的。我其實結婚有一陣子，大概6、7年了，到現在還是有點不適應，包含吃的我也不太適應，因為他們台南口味都好甜喔，公公他們也好愛喝湯喔。都跟我的飲食習慣、生活習慣啊也不太一樣。就是，台南人來台北就一直喊冷啊，可是我都穿短袖啊，我公公婆婆就說妳不冷啊？我說我覺得我很熱。我常很習慣汽車就是代步工具，可是我根本不會開車，我是我們全家唯一不會開車的人。我們之間撞擊的火花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我深深地覺得融合這件事情需要花時間的。但是，情感這件事情，它是沒有界限的。我們所有的衝突，或是所有的不和諧，都可以在情感上面去作妥協。就像我老公配合我，然後我配合他。

林寶安：我記得還提過說，台南人吃虱目魚啦，很多的生活細節，對她來說沒辦法想像，台南人為什麼一大早就開始吃有的沒有的。我想真的是生活習慣的不同，可是也是透過這樣的文化接觸，才會讓不同的生活背景有機會去碰撞。我們有一點時間，開放一些提問。

觀眾：請問一下妳住的眷村是什麼眷村？

張文竹：我媽媽住在高雄岡山的眷村。

觀眾：因為上次去台北聽演講有提到，裡面住一位叫苑覺非，他是張敏之那個學校的副校長。

林寶安：苑，苑校長。

觀眾：他們家的情況就是和你們家的情況一模一樣，所有的人都會擠到他們家來聊天。所以他們家門永遠沒有在關的。

張文竹：可是那個校長可能和我們不一樣。

觀眾：你們都屬於文人。阿兵哥階級過來這邊，有什麼不一樣？

張文竹：阿兵哥過來階級……我覺得文人也不算吧。我覺得算是學生過來這邊。

觀眾：這批學生裡面後來有一些非常有成就。

張文竹：那我爸就是沒有成就的那一個……哈哈，我爸就是那個最平凡的。因為我覺得他沒想過要什麼達官顯貴往上爬，他只想要回家而已。我爸心裡面就充滿了回家。

觀眾：可是我聽那個阿兵哥階級，其實他們的想法也都一樣，要回家。他們就是要回家。你們和他們的情況也一模一樣。

張文竹：我外公外婆他們都在岡山眷村，但可能是我外公和外婆一起來，所以他們來的時候還生了很多孩子。就在這個土地上落地生根。我覺得婚姻，還有血緣，都是可以真正的在這塊土地上紮根的重要要素之一。

林寶安：有沒有其他人想要跟文竹老師交流的，有沒有？任何的一個想法，都可以。

觀眾：剛剛那個故事還蠻感動的。我想問一下，你的身份認同可以說是30歲那年結婚的時候，才開始意識到說自己是台灣的其中一個部分嗎？還是你的身份認同從以前到現在都覺得我根不是在台灣？

張文竹：其實我是28歲結婚啦。可是我覺得我28歲之前，完全沒有想過身份認同這件事。我覺得我在這邊過得很好，我也不會想要尋根，了解我是山東煙台的後人，我完全也不會。就是一般的年輕人吧，我覺得大學畢業，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後，就開始想要擇偶，我只想要完成我人生的進程。

我覺得關於身份認同這件事情，並沒有去想過。一直到我想要跟我女兒講我的故事之前都沒有想過，因為我覺得，一切都順順，很好啊。

觀眾：關於713這個事件，因為自己這樣的背景，家庭背景的影響下，這樣的政治事件，會影響到自己本身的認同嗎？意思是說這個事件的建立者，713白色恐怖的建立者，或是說對國民黨政權的看法，對親族認同的看法，會有影響嗎？

張文竹：若是我爸的政治立場，我可以很明確的回答你，我爸是非常忠貞的國民黨員。奇怪了，對他們來說就像父母一樣。我爸是非常忠貞的國民黨員，如果是我爸的政治認同，即使他也是經歷過713事件的人。其實這批流亡學生，幾乎都是非常忠貞的，鐵票，忠貞的國民黨員。

觀眾：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一直期待。期待說，帶他們回家。

張文竹：對，帶我回家。

觀眾：大家好，我本身其實跟文竹老師有比較類似的背景，我是外省第二代，爸爸是甘肅人。甘肅其實就是西北，台灣很少甘肅人，我一直不懂為什麼，有一次是因為大陸學者碰到，我說甘肅人在台灣很少，他說當然啊，因為毛澤東都是陝甘那地方的人。蔣介石怎麼會信任甘肅人呢？怎麼會去信任西北地方，所以我才恍然大悟這樣子。所以剛剛講的那些認同問題，我爸也是非常忠貞的國民黨員。事實上，他也曾經因為西北有扭秧歌這樣的一個習俗，我爸就講過一件事情，他有一次在軍中，人家說，欸，扭秧歌會不會扭？他說，會啊，扭給他看。這件事情就被人家告發，但是先擋著，要不是，後果不堪設想的。所以我都感同身受。

我今天想要請問文竹老師的一點就是，剛剛講到，整個從軍逃難的過程，充滿創傷。我爸甘肅背景也是如此，因為他是從山東煙台這樣過來一路逃難到香港，調景嶺，我其實也去調景嶺看過，然後一路逃到台灣。我爸和我媽年紀也是相差蠻大，12歲，我媽媽是花蓮人，道地的台灣人。其實也是從台南搬過去的，我媽是在台南出生，但是在花蓮和我爸相遇，然後結婚。但是我心裡想問的一個問題是就是，這樣的一個創傷，在家庭相處上面，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因為我爸其實脾氣真的不好。

張文竹：我爸也是。

觀眾：真的超不好，對！很怪。

張文竹：都拿拖鞋打我，小時候都拿拖鞋，不然就是衣架，就這兩個東西，就近取材。

觀眾：對，可是，因為您蠻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嘛。我爸爸他是在差不多11年前過世，83歲過世。其實在這過程中我們感覺非常高壓，其實並不是非常親。但是我現在印象最深刻的是，結婚生兒女之後，我突然懂我爸。因為我爸以前常常講一句話說，十幾歲就離家了。後來我就懂了。所以在離家之後，他心靈就沒有再成長過，因為那些件事情是他沒有辦法承受的。所以他的心靈就再也沒有成長過了。所

以認同那些問題可以談，可是我想先談我懂了我爸爸，他當年的創傷，他不能承受苦痛，然後變成怎樣的一個性格。

林寶安：妳要不要回應一下？

張文竹：我覺得我爸的傷口是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平復。因為那個冤案在他過世之前沒有平反，大家聽到這個案子都覺得很害怕。他們都覺得被監控著。所以我覺得他那個傷口是不會合起來的，永遠也不會。因為這個冤案50年後才平反，而且他們煙台聯中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包含出了40年紀念冊、50年紀念冊，甚至拜託國大代表，一直要為這個事情平反。他們做非常多的努力努力，而且他們煙台聯中(我只了解煙台聯中)，他們甚至有固定的校友會，大概每一、二年就會舉辦，就在員林，我爸在的時候，因為我有問我媽，我爸每年都會去。但是他都不會跟我媽說，他們煙台聯中裡面的學生講了些什麼。因為我爸有家庭了。他們也不會太過張狂，免得拖累自己的家庭。他們就是默默的。我覺得他不曾痊癒，不只是這個傷口不曾痊癒，這一路下來到他過世，他的傷口太多了，永遠也不會痊癒，在我心中，在我生命裡，也永遠不會。

林寶安：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文竹老師的這一場就先到這邊。緊接著就要請莊老師，請莊老師上來坐，謝謝。

我因為後來才跟他連絡上，然後，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生命故事。待會大概十幾分鐘聊了一下。其實我今天很想要多了解情況一點。另外，因為我們這一個計畫的關係，後來人權博物館那邊也希望我們繼續來整理一些相關的記憶。包括當事人的另一半，可能是在世、目前還健在，或者已經是遺孀的這一個部分。因為有很多的生命經歷大概是另外一半會更清楚。那文竹是屬於第二代，莊老師也是屬於第二代。但是，所能夠了解的，跟另外一半是不太一樣的。雖然我跟莊老師這兩天只透過十幾分鐘的電話，可是就已經知道說，生命的經歷，尤其他父親跟他母親還有他成長的一個經歷是我目前所沒有看過的。等一下，也很期待可以來分享這一個部分。我想是不是先請莊老師先談一下，因為源頭當然都還是流亡學生，然後莊老師的父親也是煙台聯中，可是，這中間好像經歷就不太一樣。這一個過程我想，先從莊老師本身先談一下，你什麼時候才開始發現自己是，或者說知道父親的這一個經歷，知道自己是第二代的這一個過程。

莊效文：大家好，其實我要回答這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做了一些筆記，但我決定不要用它了。因為我剛剛聽張老師講了以後，我想起我們這一代雖然後面有很多經歷不同，但是其實有很多非常類似，會觸進，直接觸到我的心裡去，就會有很多的哀傷跟悲傷的東西。但我試著不要去悲傷它，因為我的父親還在，他明年要88歲，我母親85歲，兩位都還在。我很晚很晚才有這樣的意識，我相信很多我們外省這一代第二代都是這樣，因為我從小，我覺得是山東人，就像張老師講的，籍貫山東濰坊，我父親是濰坊。濰縣，我們以前叫濰縣，不會寫濰坊，山東濰縣人；旁邊是什麼，南面是什麼，我們家的村是什麼，我還沒有認清楚我住在哪的時候，就很清楚的，我山東的家是什麼樣子。

我們也是一樣，在開放以後回去，沒有祖墳，完全一樣。唯一在大陸留下來的姑姑，帶著我爸爸到那個地方，指著說，這就是父母以前埋的地方。我只有看到我爸爸趴在地上，那種沒有辦法解釋的痛苦。那真的是大哭一場，沒有辦法解釋。但是在這個過程我怎麼去認同我自己這件事情，我跟我父親其實一樣，我覺得我父親有一個認同危機，我也有一個認同危機。我們在我的學科，叫音樂學，我是後來唸音樂學的，我們叫"diaspora"，離散，也就是說，「我到底是誰？」在我們研究的這一代裡面，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大學之前，跟我的大學之後，我是兩個人。我知道我父親在以前跟以後也是兩個人。可是，他在這個認同的危機上，強烈的錯亂感是非常非常強的。因為我的父親對於澎湖的那個張敏之張校長，以及後來製造的冤獄，我現在想不起來名字叫，痛恨之極。但我父親跟我講起這件事情，都已經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我從我父親聽到的會是什麼呢？他小時候，我的祖母，帶著他逃亡，二戰的時候逃亡的歷程。我爸爸會告訴我說，奇怪，我小時候牽的是兩個妹妹，可是長大後剩一個。這種立場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說，在逃亡的過程中，她就死掉了，小孩子怎麼有一個不見了。我父親就提什麼呢？我父親會提，他到了台灣島以後，怎麼從基隆開始，然後怎麼去見到同是山東的親人，只有一位，唯一的一位是跟著山東青島警察退伍，撤退到台灣，然後他之後怎麼樣生活，怎麼一路走到現在。

澎湖那段是從來沒聽過，在我小時候是從來沒有聽過，連我媽媽都不知道，幾乎沒有人知道。我知道的狀況是這樣子。其實我真正聽我父親在講「澎湖流亡學生」，他不知道「713事件」這個名詞，可能知道有被丟到海裡這件事情，是很晚很晚，幾乎是最近這10年的事。可是我回溯這10年是我父親退化得非常嚴重，10年我父親第一次提這個事情的時候，他心臟開了個大刀差點走掉。再來就是他後來第二次，第二次也是心臟，就是3年前。慢慢這幾年他開始提，可是他已經錯亂，我問他你什麼時候到的？你有沒有看到實際上發生的事？他是沒有看見的，因為他不在澎湖。

他其實沒有看到，但是他都是聽聞，現在我再問他說，你哪一年怎麼樣，哪一年怎麼樣，他全部都回答民國38年。他唯一記得是，我問他，你什麼時候離開？他會告訴我38年6月離開。這件事情是清楚的。我後來去查了一下，我父親搞不清楚是第幾批第幾批，我想他應該是第一批，我後來去查的資料應該是第一批。所以我很晚才知道這件事情。其他有很多的經歷，比方像說，我們家和其他外省家庭的那些關係，眷村裡面不是山東的，因為我父親不是軍人，這些關係我們都非常地像。就是很有趣的一些事情，謝謝。

林寶安：因為昨天我們在電話裡面談的時候講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在眷村長大？那這一個過程是不是可以和我們分享？因為我聽了也覺得是非常surprise，很Amazing的一過經歷。因為像文竹老師算是外省圈子裡面的生活長大的。雖然您母親是客家，可是，也不是在客家，像陳芸娟老師是在客家的環境長大。所以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說，這種生命經歷，讓我們知道說，原來台灣這麼樣

的一個多元。

莊效文：我父親是到台灣以後就逃走了，我父親沒有被編到軍隊裡面去，第一個原因是他謊報年齡、謊報姓名，唯一真實的是他的身高不到該去當兵的身高。各位看到我這個身材，我告訴人家我是山東人，他就說，山東人不是都人高馬大嗎？所以我父親不是人高馬大，我不是。這讓他逃過一劫，他沒有去軍隊裡面。那他逃了有多久？他根本不記得，他說好久喔，好像有10年，當然根本沒有，可是我相信好像有10年那種痛苦。他不知道那個生活是什麼樣子，他到了台灣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在山東一起逃出來的，我們隔壁村的姓張，兩個人，翻了牆走掉。然後兩個人就，不知道怎麼樣了，沿路撿垃圾啦怎麼樣，拔野草吃這樣子，跑到台北來，想要去找看看台北有沒有生活。當然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過程，我就先略過去，慢慢講。

我父親後來，他自己的努力，考到了國中老師。先到古坑，到金瓜石、鶯歌，然後最後到苗栗，在那邊人家介紹他認識我媽媽，然後我是在苗栗出生。我出生不久之後，我父親考上台灣最早一批到山地服務的校長。我們就到了那個時候的角板山，各位知道角板山嗎？在桃園市的復興區。到那邊去創建那個鄉的第一所，也是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所國中，所以我的童年記憶是在那個地方。

我妹妹出生不久，我跟我妹差一歲，我們兩個出生不久，我其實對苗栗完全沒有什麼印象。但是我有印象以後，我旁邊就是復興鄉。所以我是在山上長大的。我們那個地方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玩的事情，這個我覺得有機會再來說。所以，我並沒有感覺有什麼不同，因為我周圍並沒有外省人。我的周圍都是泰雅族。所以，我的母語是普通話，就是我們講的國語，我沒有一點客家認同。說實話我媽媽是客家人，但我沒有客家認同。但我有很強烈的原住民認同，因為小時候，我的第二語言是泰雅語，我所有朋友都是原住民，所以我後來娶了個泰雅族的太太。但是她不是我小時候認識的人，後來才認識，但是是同鄉，是復興鄉的原住民。這個就是大概的過程。後來從復興鄉，隨著我父親從復興調到大溪，擔任大溪國中的校長。我之後就變成閩南人了。我有沒有閩南認同？我其實不知道。因為後來的一生，從那時候開始，我的朋友變成通通都是閩南人。在閩南的大溪，閩南的桃園成長，然後我的所有朋友都變成閩南人，都變成講閩南語的了。他們叫我番仔，因為我從復興鄉來的，我會講泰雅語，就是不小心會講。他們知道我不是番仔，可是又會叫我番仔，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沒有什麼不妥。我從來不覺得我被叫番仔，會像原住民被叫番仔那麼的生氣，因為我知道不是，他們也知道我不是，可是就這樣叫我。這種中間那種錯亂我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奇怪的。

我再補充，最後，我妹妹嫁給閩南人，桃園蘆竹人。我弟弟娶了一個台中的客家閩南混血兒，所以我們家什麼都有。

林寶安：昨天一聽的時候就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經歷。顯然就是說，之後可能還要再找莊老師做一個訪談，我們希望把一些口述歷史的資料可以整理起來。我想先補充一個背景就是說，剛剛莊老師講說他父親逃走，因為1949年，流亡學生到這邊，第一批是6月25號，所以您父親是6月25號到漁翁島，就是現在所謂西嶼。第

二批是7月7號到馬公，然後7月13號就編兵。後來他們在那個地方，您父親就是進入子弟學校，其他就編了兵。那子弟學校在民國42年的時候遷校，就是剛才講的苑覺非苑校長，把這個學校遷到了員林實中。所以，他是到員林實中的時候，就翻牆，逃走了。這個部分我也是第一次聽到說，竟然有這樣一個事情。不過我們知道，山東流亡學生來之後，因為編兵的這個歷程，其實有很多所謂的開小差，就是逃兵，逃走了。開小差的其實還不少（莊：對我知道的還蠻多的。），在那個兵荒馬亂時代，可以用假名，可以謊報，年齡啦，很多東西。只要你可以找到一個幫你做假的，包括我們那時候還有受訪的一位當事人，一個遲伯伯，他是可以幫人家刻印，幫忙偽造一個官印出來。這些都是發生過的，真正發生的，在那個戰亂時代這個是的確，而且因為他們本身都是算是相當良好出身，書法，篆刻，這些大概是不在話下。

所以，我剛剛只是先補充這個背景，但是，我想是不是可以再請莊老師來談一下，因為我覺得那樣的一個過程，生活裡面的一個經歷，剛提到的這個過程，我們看到父親是山東，然後母親是客家，苗栗客家。可是你從小有記憶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是在山地鄉了，就在復興。所以，這樣的生活裡面，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分享一下就是說，在生活裡面，你可不可以讓我們知道在這裡面，有哪些不同的元素是，很多文化，在生活裡面所產生；或是說，那一個過程，對我們來講，我是爸媽都是閩南人的這種家庭長大，所以我無法理解說在這樣的生活裡面，比如說像我們剛剛一位甘肅來的，那可能她生活裡面就會是很多不一樣的東西。那，我不知道像你那時候從小開始有記憶，開始懂事的過程裡面，成長的歷程裡面，是不是可以從生活裡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莊效文：如果是在我家裡面，跟其他的那些外省家庭或者山東人是一樣的。就是我們有非常多的麵食，而且都是父親自己會做，麵條自己擀，餃子自己包。過年一定要包餃子，而且還要把錢包進去，看我們哪個小孩子會吃，我們以前是1角，這種故事在我的成長，我的家庭裡面是沒有問題。

我現在回想，我的媽媽後半生，現在的我媽媽，跟以前很不一樣。我從小從來沒有聽過我媽媽講過什麼話。我覺得我媽媽在她的前半生是一個完全...就是我父親怎麼樣，她就跟著怎麼樣。我從我媽媽的嘴巴開始聽到提到我爸爸，我父親，是我高中以後的事。那個事情，高中以後，換句話說就是我唸大學，我是1985年唸大一的。各位可以看得出來我的年齡，這是外表看起來，因為我爸爸的基因，一直都個子比較小，很多人都以為我40歲，事實上是假的。我爸爸是在復興鄉的，現在的介壽國中，當第一屆的校長，我的鄰居就是宿舍的那些老師。但是我的下面，我的同學，都是原住民。我有一個非常好的原住民朋友，他們的漢姓是李，可是我已經忘了他的原住民名字。因為那時候不准用原住民的名字，他的爸爸是很好的獵人。我跟他常常在我爸爸還在忙公務的時候，小孩子半天嘛，我們以前那時候學校是半天，然後我就不見，我們打著赤腳到山裡面，那些原住民的東西我什麼都吃。我記憶中有一次被我媽媽逮到，那個逮到的原因是因為，有一個阿兵哥知道我是校長兒子，他看到我在吃一個他覺得不該吃的東西，然後去報告，不知道怎樣傳到我爸爸那邊

去，把我逮回去用繩子吊起來打。我們這些外省爸爸，都有一個脾氣，都不太好。這一點我覺得我還可以補充說明，但我覺得我等會再來說。你們知道吃什麼嗎？那些原住民的小朋友吃什麼我們就吃什麼，他們抓了一隻松鼠，把毛燒掉，剖開來，把腸子就生的吃下去。我想說他怎麼吃我就怎麼吃啊，我們有一個東西叫鰻麵，鰻麵就是那個生魚把牠用一些鹽醃起來，那個我都照吃。所以，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我們家3個孩子都有一個特徵，從南到北都吃，我們偶爾從復興鄉，回到苗栗，當然客家菜就吃，你看我小學二年級就到大溪，那些閩南東西都吃，酸甜苦辣，鹹的甜的我們都吃。

這個造就了我，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我到世界各地旅行什麼東西都吃。我唯一不喜歡的是，我爸爸小時候拼命說這個很營養一定要我吃很多，是胡蘿蔔。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小時候我爸爸非常喜歡吃胡蘿蔔，長大只要看到胡蘿蔔我就走了。但是我其他的完全不挑。

張文竹：松鼠的腸子好吃嗎？

莊效文：有點像牛奶。那個味道，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妳要不要吃吃看？

林寶安：你剛剛提到你父親，本身都會做這些麵食。所以有哪些麵食？除了餃子之外。

莊效文：餃子、麵，麵是最多，以前他會一做的東西，我們家鄉話叫槓子頭。大家現在都知道了，還有窩窩頭，我們還會做餅，山東大餅，這些都是我們最常吃的。我們吃餃子跟台灣人不太一樣，台灣都是餃子配酸辣湯，我們家從小，餃子撈起來以後那個湯就叫水餃湯，就是這樣喝的，要是丟掉的話，我爸爸他會氣死。他常常講一句話，我們逃難什麼都沒有，你現在敢怎麼樣。所以我們小時候沒有人敢桌上面有飯粒，那個會被打死的。

林寶安：我們稍微談一下，其實，我是一個道地本省人，可是我超級喜歡吃麵食，像剛剛提到說，父親因為逃難關係，有一餐沒一餐，所以那個足拚拚，台灣人說足拚拚，意思是很節儉。只要有東西一定要吃完，不可以有任何剩菜剩飯，沒有吃掉的，吃一半，絕對是被打的。我覺得在你身上更可以看到這件事情，因為父親、母親，以及後來從小生活的環境，包括松鼠怎麼吃，無法想像，但那樣的一個生命經歷，就像你講的，也許這成長經歷，所以使得對你來講的話，這種接觸異文化、新的元素這種，對你來講是一種很容易能夠跨越門檻界線。

我會特別提一下麵食，我一直覺得台灣這個社會的麵食，基本上大概主要是，山東，這些麵食是外省人帶來給台灣的一個禮物。一部分當然也是1949之後，很多這些外省伯伯他們退休，他必須要生活，所以他們要開個店。那麵食它門檻比較不是那麼高，所以開一個小店，我想這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至少，我覺得說怎麼樣去，麵食的這種生活對外省人來說其實是重要的一個因素。所以我剛才會特別請你談一下這個部分。

可是，對我來講比較好奇是，後來你說你大學以後跟大學以前是兩個不同的人。這個部分可不可以來跟我們談一下，因為我覺得這可能也讓我們比較清楚這個歷程裡面，你到底是怎樣經歷過來的，尤其是跟父親這樣的一個生命經歷。

莊效文：我其實很有興趣也是這些部分。因為我相信有很多外省人流亡故事都大同小異。大家都會講那些東西，很悲傷。但我一直很關心的是，這些事情發生以後，不管台灣人民、客家人，或原住民等等，同在這塊土地上的這段時間，大家在想什麼。我為什麼講大學，因為我高中離開家。國中的時候發生美麗島事件，那個時候我絕對是慷慨激昂，老實說，莊效文你有什麼話講，我一定說把那些人都槍斃。後來我想他幸好沒槍斃。但是，那個認同在我小時候是絕對沒有問題，就是我是山東人。

可是我覺得我父親的跟剛剛我講的脾氣，我覺得可以一起討論。就是，我父親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我從小到大，沒有聽從我的爸爸口中提到說我們要賺錢，我們要做什麼，他作為一個校長，在山地服務，我從小就聽我爸爸說，我們要幫忙那些...那個時候叫山地人，因為他們很窮，我從小就聽到這個。但是另外一面我父親又有外省人那種受苦的堅硬，他脾氣都不太好，我們真的有做一些踩到他紅線的話，真的是吊起來打，這個都是有。所以，他的這種很極端的兩面到現在為止都還在。現在因為他心臟開刀兩次，我們現在需要給他一些安定劑，所以他不會發脾氣。

我覺得現在最糟糕的是電視，電視打開中天，韓粉的東西出來，他原來的那種認同就會爆發，所以我們都盡量把電視關掉。我的父親從小讓我認識山林跟這片土地，我第一次開始有記憶是我爸爸訪問那些山地的原住民。那個時候可不是像現在開一個車，我們那個時候學校是在角板山，可是我們要走到現在的上八里，各位要知道，那是30公里，不是24公里。我爸爸帶著我這樣去走。這成就了我什麼樣子呢？成就了我在21歲就拿到台灣高山嚮導證。玉山我已經去十幾次了。十幾次沒有什麼，對我來說是小時候的生活環境，讓我有這樣的東西。這些東西在我離開進到大學不一樣的領域以後，我覺得我開始有一些想法。這些想法當然是我的知識，還有生活歷練，我的朋友什麼都有，原住民，閩南人都有。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對這個土地，我對我生活的這些山林，我非常有感。這是我父親給我們3個孩子的禮物，3個孩子都是喜歡山林。我覺得台灣有很大的問題，我根本不在乎你是藍跟綠、你的政治立場，而我在乎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很關心這個土地。因為將來要對這些地方這個土地真的有感情，我們才會真實地想要把這個地方做好，想要真正地對待我們生活的地方。

我常常最痛心的事情是，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房子被拆走。然後這個拆掉的原因就是經濟考量等等。這考量是什麼，就是說，那麼漂亮的房子它有歷史價值，可是我看到是說，因為它多少年所以它不是古蹟。可是這種心態是一個對土地沒有感情的理解。我們有沒有想過，它不是古蹟，可是它是我們孩子們的古蹟。我們現在把一個還不是古蹟的東西就拆了，我們的後代永遠沒有古蹟。可是，像這個觀念竟然是我父親這個外省人給我的，這是我覺得非常有趣。

當然，我父親不是軍人，他是流亡學生，琴棋書畫非常非常喜歡。我從小喜歡畫畫，喜歡讀各種文學，我父親本身，這方面給我的影響非常非常大。我覺得後來學音樂學藝術這件事情，從真、善與美的三個不同的層次去看到人這件事情，加上我的朋友閩南人什麼都有，我自己覺得，可能是自我良好的感覺，我其實很了解閩南人，我也很了解外省人，我很了解原住民。我唯一不大了解的是客家人，因為我真的沒有什麼客家認同。這個是有其他的原因，以後再說。

這種了解，我覺得這樣講，我們要彼此了解，其實是很困難。比方說我們去了解原住民，我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原住民的衣服、原住民的食物、原住民的歌舞，不是真正的原住民文化。他們是文化的外表。文化內容的外顯，我們用一個嚴肅名詞"Vorstellung"這個字，不知道怎麼翻成英文，我這樣講好了，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我，我的外表是這個精神的外顯。所以真正要了解一個人，不是看他外表，是看他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是缺乏一種相互的理解，那我們認為的理解常常只是一種外表的認識，我覺得這是不大一樣。而這是我的優勢，謝謝。

林寶安：其實剛剛莊老師在講這個經歷的時候，我就想到我目前在澎湖也在試著去理解澎湖的一個漁村。

在您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不同時期來到台灣的一些不同的族群，就在他身上展現。那唯有能夠真正生活裡面的接觸，才有機會去認識。

先講一個背景，我當初要做的這個計畫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713，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山東流亡學生，這個名詞我連聽都沒聽過。在那個狀況底下我完完全全、毫不知情的狀況底下我就接了這個計畫。因為澎湖縣文化局長就問我說，林老師你可不可以來幫我們做一個計畫。我就說好啊，然後，就開始了。在那個當下，我那之前我腦袋是一片空白。對這一段歷史，對這一群人，對整個他們的經歷，完全沒有概念。可能是因為自己本身唸社會學，我對歷史非常關注。所以我對於很多議題都是比較是保持一種開放。長期以來做的都是一種跑田野的方式，再搜集這樣一個資料做研究。所以，30幾年間曾經訪談的人到現在應該超過1,000位。這一個過程裡面，我想，跟莊老師不太一樣的是，您那個是一個很直接的生命經歷裡面，真正可以去認識這樣的原住民。所以，倒是可以期待說，以後搞不好您可以把這部分的理解記錄下來、整理出來。因為對於，我覺得特別對台灣社會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莊效文：我也是這樣覺得。可是我們有時候要...好像嚴重一點的字叫「對抗」，我們要對抗的有時候其實就是學者自己。因為很多原住民的學者也研究原住民音樂的東西，那麼，因為升等不需要理解太深嘛，升等需要的是生產知識的多寡，而不是生產知識的深淺。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啦，以後再說。

林寶安：因為今天課題不在那邊，所以我先回來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再分享一下，我覺得對於我們，如果今天是一個訪談的話，我會問你一拖拉庫。但是

我們這個時間有限，是不是可以談一下，後來當你開始發現這整個跟事情的關聯，比如說，我記得你昨天也講說，好像沒有多久，才開始接觸這個事件，才開始接觸一些相關的文獻，包括陳芸娟老師的論文等等。這個過程，你覺得對於你來講的話，跟這個事件接觸後，內心的感受和想法，還有未來希望可以怎麼樣繼續，有些部分我剛才已經講，明年我一定要找時間來訪問你，如果有機會我們可能來合作。

莊效文：謝謝。其實，我想主要是因為我父親對那一段事情有一點保留。我想那個時候好像很多人都是這樣子。我那些父親的朋友們，後來一起相聚同事流亡學生的朋友，我們都認識。狀況跟張老師其實是一樣的，他們不會在我們後代講太多，關於這種很敏感的事情。這個是我覺得的共通點。所以，如果人家問起我父親，你父親到底是怎麼來台灣，你知道嗎？他們後來怎麼找的理由，就是那個，警察的那個，我爸爸的五叔伯的五爺爺說，你就說你是在我們警察撤退，從青島那裡，抓起來，你就上船然後下來，就這樣。所以他一輩子告訴人家，他怎麼樣從青島跟著警察來到台灣。

那我自己學習歷程是這樣子，我剛剛說我父親其實很喜歡音樂，就是這種美術、藝術，小時候在復興鄉的時候，我父親覺得我們要去學這些東西。那天主教是唯一的教堂，我跟我妹妹被送到天主教堂，一個修女，去學鋼琴，一個月上一次。我們家沒有鋼琴，學校只有風琴，就用風琴這樣。我非常喜歡音樂，又喜歡畫畫，又喜歡文學，其實我選擇大學唸音樂系是一個意外，因為第一志願填的是台大外文系，我非常喜歡語言，沒上。因為台大外文系當時是文科第一志願。我就掉到第二志願音樂，我就唸了台北藝術大學的音樂系。我主修音樂作曲，然後交通大學的碩士唸的是Computer Music，那當然也是一個比較創作性。畢業以後先在台灣藝術大學任教了7年以後，才唸博士，音樂學。我唸音樂學一開始，唸西洋音樂史，但是因為我自己是作曲的，我對台灣的當代創作還有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創作很感興趣。我開始想了解說，日、韓、中國、台灣，包括香港台灣這些地方的創作，跟歐洲的當代藝術有什麼不一樣。

從這個地方我開始發現說，研究台灣的這些音樂創作和藝術的東西，必須要把這些東西擺在台灣的歷史。也就是我把台灣的歷史當作一個地圖，然後這些東西是在地圖的某一個點上，跟台灣有根源。從這個地方開始，我就進到台灣史這個領域。我進到這個領域以後，才開始進到跟台灣歷史研究有關的技術，包括口述歷史，去參加口述歷史，那個口述歷史對我的影響很大。為什麼？因為我開始知道，原來我父親是一個非常好的口述歷史對象，可是我試著在做的時候，我父親記憶已經混亂。就像我剛才講，我問他說，你到底是哪一年去唸大學？哪一年到基隆？哪一年到台北？他全部回答都是民國38年。現在這點可能已經沒辦法釐清。我試著去找，但找不到他的大學畢業證書。而他高中畢業證書怎麼來的？是他在台北掃馬路的時候，他聽到一個像山東口音的人在賣報紙，抬頭一看，同是流亡學生也跑到台北來的人，兩個人相擁而泣，最後透過那個人(後來他當了牧師)找到了山東流亡到台灣的長樂中學的校長。長樂中學的校長就是蓋了個印，弄個東西就說我爸爸高中畢業。但，事實上一天高中都沒唸。之後在那個聯中，山東有聯中，那我問說你在那個聯

中有沒有唸？他說哪裡有唸？每天都在逃難，哪裡有唸一個字啊。所以，他就用了這個畢業證書，後來去考到大學。我說你有沒有留下來，他說因為害怕，這些都藏起來，都丟了。太可惜，我覺得如果那些都留下來，偽造的東西都是歷史證見，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開始去做我父親口述的這些記錄大概三、四年的時間。也就是我父親最後差一點離開我，也就是我回到真理大學沒有幾年。謝謝。

林寶安：聽起來是很特殊的經歷。我覺得這樣的歷程，大家可以理解到的是，您父親的那一種琴棋書畫、涵養，我覺得其實這在流亡學生身上都可以看得出來。因為我們接觸了很多伯伯，他們大概都是一樣，就是好人家出身的。我覺得那個部分在你身上，尤其是你父親又擔任校長，我想他這種背景，後來他拿了一個假的高中畢業證書...我覺得這個例子更是如此，國小畢業而已嘛對不對。

我想在那個時代來講，如果你真的是要拿他的國學造詣，那他們的造詣其實都是很好的，是相當好的。只是我們現在用學歷來比的時候，可能就各科都要有。不純粹是傳統的這些，可是他們的程度都是非常好，非常高的。

所以，也是這樣子，我希望有點時間可以讓在座的與會，大家可以跟你來做一點交流。

我想要請你談一件事情，我一直覺得說，不只是外省，我自己因為是很關心台灣的一個出身，雖然我是台灣人，但我也很關心外省人，關心新移民，我做新移民的計畫大概已經，大概做了十年，就是新住民，東南亞籍配偶，大陸配偶這些部分。過去的不管是原住民、山地仔，阮在講山地仔，以前歷史上用這個番仔，這個字眼，基本上是不同時期來到台灣的。那我現在在澎湖那邊也是在開展這些澎湖的研究，我一直在想說，可不可以請你談一下說，從你的角度或者從你所認識的你的父親，你覺得他所帶給台灣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就像剛剛已經談過的一個問題，其實每一個人來到這邊，每一個族群來到這邊，雖然前面也談到就是說，這是所謂的"diaspora"，離散的一個時代，因為戰後是一個離散的時代，我以前做的，我碩士論文就是在談猶太人的離散，猶太教的那個部分，可是，我覺得20世紀這個大的戰亂所帶來很龐大的一、兩百萬的人來到台灣的這樣的一個離散的經驗，以及，這些人來到這邊，當然您父親不能代表，他是其中一位，可是我覺得，切身的一個經歷，以及你看著他，因為你是在他底下成長，然後對他也很多的一些生命裡面的理解。那他現在到了這個年紀，也在照顧他。我想這個過程裡面，可不可以跟我們來談一下，在你眼中，你覺得從你父親身上，或是從這一群人身上，你覺得他們給台灣社會帶來什麼？

莊效文：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我覺得這問題基本上可以寫十篇、二十篇博士論文。當然我知道林老師的意思是很簡單來談談。我覺得可以從兩個事情，我看我父親，從小帶我到復興鄉去，帶那些原住民，我父親對他們非常非常的好，是非常非常誠懇的一個人。從一個中國人過去的那種文化角度來看，我父親他自己覺得他是

個菁英。雖然他沒有菁英這個字在他心裡，但那種態度是菁英，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有文化的，原住民是番仔，沒有文化。他是這樣的角度看待事情，可是他卻沒有那個傲慢。也就是說，我父親教導我說，他對待原住民非常非常友善。但是另外一方面，國民黨不是過去中國人那種教育就是，我們是好的，他們是西夷、南蠻、北匈奴，全部都是外邦，就是這種態度，我覺得我父親給他們，在那個部落裡面，在我從小生活的部落裡面，我這樣子講好了，各位朋友，如果我現在回去復興鄉，我只要告訴原住民，我爸爸是莊鶴齡，他們還記得。他們說，從來沒有對我們那麼好的外人。所以爸爸是什麼？他們的說法是Tayal balay，如果這個Tayal balay，就是誰的balay是tayal是同一個意思，就是「真正的人」。我說沒有啊，其實我們漢人都很好，他們說沒有沒有，愛錢。很好玩，這是原住民。我說，不會啦，這個都是一部分。我說那閩南人怎樣？他說，「歹人」。我覺得我很難解釋這件事情怎麼樣，但是我相信，他們接觸外面的人，因為原住民在復興鄉並沒有經歷二二八，所以他們印象中被派到那邊去服務的軍人，像我爸爸這種人教育人員，其實都是軍方給他們很多幫助的。

至於台灣，我覺得這個地方，比方說我聽到深綠的朋友跟我說，你們這些外省人滾出去，眷村不是台灣。我說眷村是台灣啊，因為中國大陸並沒有像台灣這樣子的眷村結構。對不對？它是一個非常特殊歷史成因，而且只在台灣發生。而且我們台灣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歷史複雜性，比方說，重層殖民性啦，這種很嚴肅的話題講起來，我覺得外省人扮演的一個殖民，也是一個某種程度的教育者。這個是一個既是又非的複雜現象。如果我們不那麼嚴肅看呢？我覺得從夜市看起來就最好，我帶我爸爸去，還沒有走出到夜市，吃個臭豆腐吧，臭豆腐怎麼是這個樣子，哪有臭豆腐加泡菜，我說台灣就有。外省人以前臭豆腐不是這樣。臭豆腐是他們帶進來的。我媽媽說，我爸第一次帶她去吃臭豆腐，她臭到快要死掉，可是完全不敢講，因為她是個小女人，夫唱婦隨這樣。這些故事都是我親身發現，那個真的是臭到不行，可是現在呢？都吃了。哪一個台灣人不吃臭豆腐？還有牛肉麵，當他們看到我們煮牛肉麵的時候，在我媽媽那邊，大叱，開玩笑牛是耕田的，台灣人絕對不能吃牛肉麵，現在誰不吃？

我們還說，夜市小吃，事實上這些都是所謂外省人帶進來的東西。也就是說台灣是一個非常多元文化，這句話我覺得常常是，很容易講，可是我覺得多元文化是很多不同層面，所謂1949年來到台灣外省人，他在所謂文化上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形成現在台灣這樣的一個文化和社會結構。

我覺得我在這個地方非常舒服，我其實在歐洲生活過兩年，那個生活環境真的非常好。我是真的必須要講，我在維也納跟柏林都住過。我覺得我的情感在這裡，這是很貼切的，我非常清楚，因為我到了這個地方，我的車子可以左右亂停，維也納不能隨便轉，這種生活上的秩序對我來說是很沒有人性，可是我一方面又覺得那才是真正應該有的社會秩序，這就是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台灣出身的人來看待這個台灣的一種情感，謝謝。

林寶安：好，謝謝莊老師的分享。我們接著就開放大家來提問，好不好？對於剛剛莊老師所談的任何事情，對於他的父親也好，看看在座是不是有些問題？

觀眾：我在歷史系上的時候，受一位老師的教導還有影響下，我對口述歷史還有現代史，就是有濃厚興趣還有研究的走向。今天的講座，我聽老師多從自己的背景、或是自己的環境，這個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個主題上著重713事件，因為有時候聽到口述歷史這個詞，可不可以告訴大家說，關於自己對於相關事件，這個事件發生經過具體的描述或具體的紀錄，就是可以讓我們更了解白色恐怖的713事件。

另外一個問題比較深一點，就是，我最近研究白色恐怖50年代初期，就是1947年到1950年代，這樣的時間點，剛好是中共地下黨到台灣發展組織的這樣的時間。但我對支部的事情不是很了解。

我想了解713事件，1949年的7月13號這樣的事件，地下黨有沒有在這個事件中被記錄下。因為我沒有看到這樣的紀錄。

莊效文：713事件，我知道的是我爸爸不在現場，他沒有看到，他也是聽山東流亡學生講的。這個是真實的，因為我爸說不出個東西來。但是他知道那些相關人物。應該是從後來，或者他應該是早就知道那些同事，他們的同鄉之間流傳。所以我沒有辦法從我爸爸口中知道任何關於那一天發生的事。

至於口述歷史這個事情，這樣好了，其實我對於所謂的台灣1947年到1991年，就是我們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我當然是非常的關心，我相信在這裡的任何一的人一定都很關心。我知道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著墨非常多，包括這方面的口述歷史，當然中研院的台史所做了很多。那我也是經常在台史所跟他們做一些計畫的研究，這是我開始進入歷史領域的原因。

當然我們知道許雪姬教授，他研究的興趣就在白色恐怖。那我的興趣在哪裡呢？我在中研院台史所提了計畫，我現在做魯凱族，就像林老師您講的，能夠保有魯凱族傳統真正文化的，而不是那個表面上的一些人，不一定是耆老，有的是和我差不多年齡，可是他們是道道地地在出生在獵人家裡，我現在做的是這部分的口述。也就是說，我想這個白色恐怖的部分有非常多人在關注，所以它就不是我最主要的研究的中心。

當然如果說今天有機會去參與這樣的活動，我會有興趣，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還是很關心它。謝謝。

林寶安：我回應一下這個同學的問題。第一，713那時候整個經過，上一場的時候我大概有談到，基本上是一個出身良好，對他們來講是要讀書的，那麼來到澎湖之後，當初國防部毀約，毀了哪個約？就是廣州協議。廣州協議是怎麼來？就是當初學生在來澎湖之前，就是一個協議，就是由教育部、國防部和山東省的這些大老，還有八個整個聯中所共同簽的一個協議，由教育部發出來一個訓令。就是學生來到

澎湖之後，半天讀書，半天接受軍事訓練，就是半訓半讀。但是來了之後，國防部是一個有官無兵的單位，所以來的時候，因為他需要兵，可能當初協議簽的時候就已經是有這個陰謀了，就是要把這些學生編成兵，不然部隊就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部隊。因此來了之後就不管，才第二艘船來了之後，7月7號來，7月13號一個禮拜後就編兵了。也就是，無論你什麼理由，我就要把所有學生變成士兵，來充實他這一個澎湖防衛司令部的部隊，做一個基本的兵源。

所以，是在這樣前提下，構成後來這一個冤獄的背景。因為校長、老師跟學生，認為違反了當初了協議，他們為了爭取他們該有的受教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如果這批學生要當兵他們早就在大陸流亡的過程就當兵了，不會等到來到澎湖。也就是他是被強迫當了兵，因此要抗議。可是對於這個部隊來講，這個部隊當時主要是韓鳳儀，39師的師長，主要是他在主導。整個冤獄案構陷的過程，主要是這樣來的。

所以當時是以匪諜案去構陷了罪名，株連了總共109位。7位中就2位校長、5位同學被槍斃，另外有60位是到了台北，到了所謂新生營，在那個地方接受9個月的管訓。另外有36位關在澎湖天后宮，總共有109位。那這一批學生，也就是後來得到賠償的部分。

另外在要去錄口供的，要去構陷罪名的過程，從109個所延伸出去的，其實就有很多他們的同學。因此，為什麼很多的流亡學生後來留下一個非常深的，白恐的一個經驗，為什麼他的生命經歷裡面對澎湖的這個階段，一直是一個不願再去面對的一個傷痛，就是因為那個過程是非常辛苦的。為了要逼供，要取供，所以採取了非常多不人道的一些刑求的一些方式。最後109個真正是被關押、被做管訓，7位是被槍斃。但是株連的事實上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前面大概有談到說，我們所訪的伯伯基本上...我因為接這個計畫的關係，在澎湖文化局那邊都會舉辦類似這樣的座談會，或是演講，那文竹老師還有一些都會過去。那其中我們有一年邀請當事人，遲伯伯，基本上他是表達這輩子他不可能回澎湖。對他來講這是一個完全不願意再面對的地方。所以，也是從那個地方我們才能去體會，當時在那樣的環境底下，人真的是一個草芥之命。我們後來訪的一些人，他們會說，拖出去就槍斃了，還管你是誰。大概就是都會有這種草菅人命一個時代、背景。

所以，白恐在這一群伯伯身上其實要從口述歷史才能知道。那至於你剛剛提到說，在那一段時間匪諜有沒有在澎湖，在哪個地方，這個部分比較不是我們可以關心的，我們大概也沒有接觸到相關的資訊。謝謝。

我們有沒有其他問題？

觀眾：老師您剛才提到你父親他沒有國中學歷，也沒有高中的學歷，後來讀大學，當校長。我後來直接聯想到一部電影就是《香蕉戀》（按：應為《香蕉天

堂》)，張世和鈕承澤演的，他也是沒有學歷，他就應去當大官那種心虛的過程，很可怕的过程。

莊效文：我相信應該有，所以他才會把長樂中學假學歷給丟了。他說，我一輩子都不知道長樂在哪裡。可是一直有個長樂中學畢業的文憑在那裡。這是我爸爸親口跟我講的，我覺得那個心虛是有的。

林寶安：有沒有其他的？我們可以再有一、兩個，再一個問題好了，因為已經超過時間了。

觀眾：其實我不是要問問題，就有點想跟講者說。我最印象深刻，我很喜歡您說到台灣的部分。因為這是我們了解外省或原住民，最後都還是回歸到對於台灣這片土地的身份認同。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可能會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在講我們的政治立場，或者是情感認同，無法跟上一輩的人做連結，因為很多可能是外省人之類的，對我們這一輩的人會特別地覺得，因為我們是一個第三代，完全、完全地在台灣生長的孩子，那我們要怎麼看待台灣這片土地。

那我們也一直以為說，我們去包容各個文化之類的，就是對這片土地的一份情感的展現。可是您剛剛有說，那個只是最表層的東西，應該要再更深入從裡面。

我剛剛真的很感動，想跟您說謝謝。

莊效文：謝謝您的回應，我做最後一的comment，也是給你一個回應。

在我做台灣當代創作，作曲音樂，有一個非常特别的例子，他叫盧炎，這位我的老師輩的，他是山西人，在江蘇出生，隨著父親來到台灣，然後再逃難到美國去，這個過程當然很複雜，我就不講。他最後的狀況是，他是道道地地的一個中國認同。完全不會講任何閩南語，他的國籍是美國國籍，他以流亡者的身份到美國定居，在美國取得了國籍，可是他在台灣工作，娶了台灣人。

我覺得他的音樂是非常典型的離散者，非常非常的悲傷。他是台灣當代非常重要的一個作曲家。

非常非常的美，而那個美就是這種悲傷。那我很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還有這種悲傷，就是這種離散情緒。

我覺得有個東西很重要，就是我們對這個地方所有事情深刻的理解。謝謝。

林寶安：最後我也針對這個部分延伸一下。我自己有一門課就是新移民的課程，因為大家都知道，人類幾乎沒有所謂純種，所以你們應該有看過Youtube上一個DNA Journey。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經歷，大家去做DNA檢測的時候，那個部分大概是針對歐洲、外國，然後那個主持人就問說，你是哪裡人？有沒有比較不喜歡哪個族群？結果最後，DNA的檢測出來之後，他身上事實上還包含著他不喜歡的那個族群的血液。像我在澎湖，我們安平古堡這邊是荷蘭人在中國土地上

所建造的第二個城堡。第一個城堡就在澎湖。後來，那個城堡原封不動把所有材料拆下來到這邊才建。城堡大概在那邊兩年多，就在風櫃尾，所以我常跟學生講說，你們如果是風櫃尾這邊出生的，一定留著荷蘭人的血統。

我一直覺得說，任何一個離散，像剛剛那個莊老師後來談到的部分，我覺得生命裡面那種緊張、張力，我想特別是從你這個音樂的創作的角度，我想就很清楚。因為太過平穩其實是沒有什麼樣的太好的靈感，或是創作，或者那種情感，能夠表達出來。所以我有時候也會覺得說，雖然台灣多族群的歷史經歷給我們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衝突，文化也是留下很精彩的一些元素，或是一些文化、或是創作很重要的背景。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我還在唸書的時候，我遇到法國來的一個朋友。他是一個貴族的世家的後代。然後我就說，為什麼要留在台灣？他說，在台灣多好啊，台灣到處每天都在...他那時候講得比較誇張，每天都殺人放火啊，我說也沒有那麼誇張，他說，台灣每天你看，一下這樣事情，一下那樣事情，多有活力啊。他覺得法國死氣沈沈，已經到達一個生命高原，已經沒有活力的社會形態。他覺得在這邊，每天看到那些事情，每天這樣，（莊：這我完全同意喔，我完全同意，在歐洲生活的人完全同意！）對他來說他在這邊他會有很多的靈感，生命的那種撞擊，生命的那種整個社會的活力是非常旺盛，台灣是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莊效文：台灣還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

林寶安：OK，那今天我們就到這邊，謝謝大家，謝謝。

（王珮穎整理；顏瑋洋審閱）